

## · 科研论著 ·

# 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萍<sup>1</sup>, 同婵<sup>1</sup>, 何姣姣<sup>1</sup>, 李逸明<sup>2\*</sup>

1.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 710054; 2. 北部战区总医院



##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nges i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

WANG Ping, TONG Chan, HE Jiaojiao, LI Yi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nges i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 **Methods:** A total of 1 224 elderly people, who were in rural Chaohu city Anhui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June 2009, September 2012, September 2015 and July 2018.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rural elderly family structure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wer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Result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status of their children and the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anges i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parents. The increase in ag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ir family structure will change into a couple's nuclear famil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emale elderly changin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ale elderly. Widowed male elderly who owned their own houses were more likely to live alone and had better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n daily life.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was more inclined to change to a single family. The more the number of sons, the more likely the elderly were to live alone. When a son lived in the village, the family structure tended to change to live with the children, and the son went out to work and returned to the elderly,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was opposit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anges i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were the result of a two-way choice between parents and offspring. **Conclusion:** we had shown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we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ly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during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Keywords** the elderly; family structure; the rural area; influencing factors; aged care; investigation

**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方法:以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分别于2009年6月、2012年9月、2015年9月及2018年7月4次调查的1 224名老年人的跟踪数据为资料来源,主要从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个体特征及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代际支持3个方面考察其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状况及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的家庭结构变动有显著影响。年龄增长显著降低了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且女性老年人变动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老年人,拥有自己住房的丧偶男性老年人更有可能独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好的老年人的家庭结构更倾向于变动为单人家庭;儿子数越多老年人越可能独居,有儿子居住在本村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倾向于变动为与子女同住,儿子外出打工及其返回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影响相反;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也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动是亲代与子代双向选择的结果。结论: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变动中中国传统“孝文化”依然在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老年人;家庭结构;农村;影响因素;老年护理;调查研究

doi:10.12102/j.issn.1009-6493.2022.01.002

随着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我国人口流动日益增加,家庭成员外出与家庭不完整状态多样化已成为一种客观事实<sup>[1]</sup>,农村常住老年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农村家庭结构随社会变革及转型的发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sup>[2]</sup>。当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极其严峻,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通过影响家庭养老进而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构成挑战。传统的家庭是基本的生活及经

济单位且具有生产功能,因此,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使得农村家庭结构处于变动中<sup>[3]</sup>。3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201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呈标准核心家庭下降、三代直系家庭上升、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同时老年人独居呈大幅度上升趋势<sup>[4]</sup>。简言之,农村家庭结构在不完整性增加的同时呈现规模进一步缩小、代际间居住分离的趋势,这对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老年人赖以保障的家庭养老方式构成冲击。然而已有的大多数关于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较少从微观层面考察其影响因素,其多是从时代变迁角度考虑家庭结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sup>[5]</sup>,或是从某一时间节点出发而并未考虑纵向变动<sup>[6]</sup>。因此,本研究重点考虑以家庭养老为主流的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变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1ARK005

**作者简介** 王萍,教授,博士

\*通讯作者 李逸明,E-mail:lymxueguany@163.com

**引用信息** 王萍,同婵,何姣姣,等.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研究,2022,36(1):8-15.

动的影响因素,主要从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个体特征及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代际支持3个方面考察其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

## 1 研究设计

**1.1 文献回顾**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劳动力外流使得老年人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都会对其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主要生活在夫妇家户和家庭、三代直系家户和家庭以及单人家户中<sup>[2]</sup>。还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在丧偶后的家庭结构受子代和自主权影响,亲子间需求越小、家庭资源越充足、丧偶老年人自主权力越大,老年人则会更倾向于选择独居<sup>[7]</sup>。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容易受经济条件制约,在经济上不能自立而需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时,老年人首先会选择居住在三代直系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次之,而经济独立能力强的老年人则倾向于与子女分开居住<sup>[4]</sup>。拥有住房作为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的条件之一,没有住房会使其不得不与子女同住<sup>[8]</sup>。另外,有研究指出,低龄老年人因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子女照料而倾向于独立生活,但高龄老年人倾向于与子女同住<sup>[9]</sup>。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是客观经济和亲代与子代主观双向选择的结果。由此,本研究将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视角分析农村老年父母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有研究表明,子女的数量和性别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农村老年人尤其依赖儿子,儿子的数量是影响其居住安排的重要影响因素<sup>[10]</sup>。儿子数量对居住安排的影响体现在儿子越多,老年人与儿子居住的可能性反而越低,这可能与儿子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有关<sup>[11]</sup>。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女儿在代际支持中已表现出显著的重要作用,女儿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sup>[12]</sup>。老年人与子女“分而不离”的网络家庭在当下农村已经盛行<sup>[13-14]</sup>,有研究发现近邻居住与子女数量有较大的关系<sup>[15]</sup>。同时,研究表明至少有1个儿子/女儿居住在本村及儿子/女儿外出务工返回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存在显著影响<sup>[11]</sup>。由此,本研究将从子女状况视角分析农村老年父母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存在影响。相比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居住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分离,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的机会。亲

代的需求会影响家庭结构变动,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且需要子女照料时其居住安排变动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会增加。同时,子代的需求也是影响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尚好时会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是其从子女处换取经济支持或情感支持的重要方式,代际间频繁的物质、情感交换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也会有积极影响<sup>[16]</sup>。宋璐等<sup>[17]</sup>研究表明,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会通过提供孙子女照料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且老年人与儿子之间的照料互惠关系随居住距离远近而有不同。也有研究表明,隔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会有所改善,儿子外出务工会增加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即隔代同住的老年人因照料孙子女而获得较多的经济支持<sup>[18]</sup>。情感支持方面,农村地区的老年母亲与成年子女间的代际关系通常更亲密<sup>[19]</sup>。由此,本研究将从成年子女与老年人的双向代际支持视角分析导致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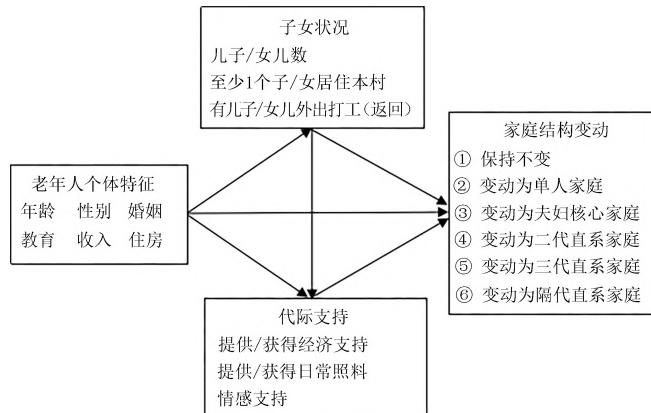


图 1 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框架图

**1.2 设定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深入探索老年父母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问题为:①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状况、双向代际支持等是否对老年父母的家庭结构变动产生显著影响;②导致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根源及内在机制是什么。

##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分别于2009年6月、2012年9月、2015年9月及2018年7月4次调查的1 224名老年人的跟踪数据。研究对象为巢湖市农村地区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调查首先从巢湖市126个乡镇中系统抽样12个乡镇,再从12个乡镇中抽取6个行政村。构成2009年基线期1 224个老年人样本,3次跟踪调查分别获得有效问卷977份、

761份和603份。本研究不包括无子女的老年人样本,最后纳入分析的4期跟踪数据的样本量分别为1 174人、933人、730人及578人。本研究分别比较相邻两期家庭结构类型(2009年与2012年、2012年与2015年、2015年与2018年)以定义家庭结构变动与否,为保证数据结构的完整性,本研究将2009年样本的“家庭结构变动”处理为未变动(赋值为0),有效样本量共计3 415人。

## 2.2 家庭结构变动的定义及赋值

### 2.2.1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变动。

表1 家庭结构变动的定义及赋值

家庭结构变动	定义	变量赋值(三级测量)
老辈独居	分别比较每相邻两期的家庭结构类型,若老年	若第 <i>i</i> 期调查时点(基期)家庭结构为非单人家庭而
①变动为单人家庭	人家庭结构从非单人家庭变动为单人家庭则定	第 <i>i+1</i> 期调查时点家庭结构为单人家庭则赋值为1,
②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	义为变动为单人家庭	即家庭结构由非单人家庭变动为单人家庭
仅与子辈居住		若第 <i>i</i> 期调查时点(基期)家庭结构与第 <i>i+1</i> 期调查
③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		时点家庭结构都为单人家庭则赋值为0,即家庭结构
孙辈存在		为单人家庭不变
④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		若第 <i>i</i> 期调查时点(基期)家庭结构为单人家庭而第
⑤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		<i>i+1</i> 期调查时点家庭结构为非单人家庭则赋值为-1,
		即家庭结构由单人家庭变动为非单人家庭

注:变量的定义及赋值以变动为单人家庭为例;研究基期是相对的,如第1期为第1期与第2期的基期。

2.2.2 自变量 自变量为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个体特征及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代际支持。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独立经济收入、住房状况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按是否丧偶来划分,将有配偶变动为无配偶取值为1,其他变动状况取值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2级测量,“没有上过学”=0,“上过学”=1。独立经济收入指调查前12个月内老年人及其配偶是否从工作中获得净收入,采取2级测量,“无独立收入=0,有独立收入=1”。住房状况采用动态指标测量,将连续两期拥有自己的住房取值为1,其他变动状况取值为0。健康状况采用利用设施生活能力量表(IADL)测量,分别为做饭、买东西、坐车、家务、管钱共5个项目,采取“自己根本做不了=0,有点困难=1,没有困难=2”的3级测量,将量表5项的得分进行累加,即为IADL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老年人利用设施生活能力越好。子女状况包括儿子数、女儿数、至少有1个儿子居住在本村、至少有1个女儿居住在本村、有儿子外出打工、有女儿外出打工、儿子外出打工返回、女儿外出打工返回,均采用“否=0,是=1”2级测量。代际支持状况包括老年人与成年子

女之间的经济、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孙子女照料。经济支持是指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在过去1年中互相交换的实物及现金总价值。日常照料是指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互相为对方提供的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采取4级测量“很少=1,每月几次=2,每周至少1次=3,每天都做=4”,将所得频率累加即为日常照料水平。情感支持通过询问老年人与子女亲近程度、相处状况及倾昕心事或困难,采用“不愿意=1,有时愿意=2,愿意=3”3级测量,将分数累加并取平均数,分数越高表明代际情感越好。孙子女照料指老年人在过去1年是否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采用“否=0,是=1”2级测量。

2.3 模型建立 本研究利用2009年—2018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4期跟踪调查数据,从老年人个体特征(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子女个体特征(子女数、子女居住安排、子女外出务工状况)及双向代际支持(双向代际经济支持、双向代际照料支持、双向情感支持)3个方面来考察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来估计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text{Logit } P = \text{Log} \left( \frac{P}{1-P} \right) = \beta_0 + \beta_1 \text{age} + \beta_2 \text{sex} + \beta_3 \text{marriage} + \beta_4 \text{edu} + \beta_5 \text{income} + \\ \beta_6 \text{iadl} + \beta_7 \text{sons} + \beta_8 \text{daughters} + \beta_9 \text{sonlarr} + \beta_{10} \text{daularr} + \beta_{11} \text{sonjob} + \\ \beta_{12} \text{daujob} + \beta_{13} \text{economic} + \beta_{14} \text{care} + \beta_{15} \text{emotion} + \beta_{16} \text{grandcc} + r_1$$

其中,  $P$  为家庭结构变动的响应概率,  $\beta_0$  为常数项, age 为老年人年龄, sex 为老年人性别, marriage 为老年人的婚姻状况, edu 代表老年人受教育程度, income 代表老年人是否有独立经济收入, iadl 为老年人利用设施生活能力, sons、daughter 分别为老年人的儿子数和女儿数, sonlarr、daularr 分别代表老年人的儿子、女儿的居住安排, sonjob、daujob 分别代表老年人的儿子、女儿的外出打工状况, economic 代表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经济支持, care 代表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照料支持, emotion 代表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支持, grandcc 代表老年人是否提供孙子女照料,  $r_1$  为随机项。

### 3 结果

3.1 统计描述 结果显示, 在老年人特征方面, 相邻两期婚姻状况由有配偶变动为无配偶的占比约为 5%。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比例呈增加趋势。老年人利用设施生活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 2009 年—

2012 年下降幅度最大, 老年人独立自主生活能力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在子女特征方面, 儿子数普遍高于女儿数。至少有 1 个儿子居住在本村和至少有 1 个女儿居住在本村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至少有 1 个儿子居住在本村的比例远高于至少有 1 个女儿居住在本村的比例。有儿子外出务工和女儿外出务工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 农村劳动力外流增加的趋势明显, 且女性外出务工增加的幅度略大于男性。样本中有儿子外出务工返回的比例略高于女儿。在双向代际支持方面, 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呈上升趋势且增幅大,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均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其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代际经济支持以自下而上的趋势流动。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支持呈现上升趋势, 随年龄增长, 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亲密程度增加。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2009 年—2012 年下降幅度最大。4 期跟踪调查样本基本特征的统计描述见表 2。

表 2 2009 年—2018 年 4 期跟踪调查的变量统计

变量	2009 年( $n=1174$ )	2012 年( $n=933$ )	2015 年( $n=730$ )	2018 年( $n=578$ )	合计( $n=3415$ )
<b>因变量</b>					
家庭结构保持不变	0	0.15±0.36	0.14±0.35	0.16±0.37	0.15±0.36
变动为单人家庭	0	0.08±0.33	0.10±0.30	0.08±0.27	0.09±0.28
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	0	0.13±0.22	0.10±0.30	0.08±0.27	0.10±0.31
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	0	0.05±0.29	0.06±0.25	0.03±0.18	0.05±0.22
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	0	0.06±0.23	0.06±0.23	0.07±0.25	0.06±0.24
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	0	0.04±0.19	0.05±0.21	0.02±0.14	0.04±0.18
<b>自变量</b>					
老年人特征	年龄(岁)	71.02±7.64	74.02±7.64	75.85±7.10	77.77±6.44
	性别:女	0.53±0.49	0.53±0.49	0.51±0.50	0.51±0.50
	婚姻:有配偶→无配偶(其他)	0	0.04±0.21	0.05±0.23	0.05±0.23
	教育程度:上过学	0.32±0.46	0.32±0.46	0.34±0.47	0.35±0.47
	独立经济收入:有	0.62±0.48	0.48±0.50	0.41±0.49	0.41±0.49
	拥有自己的住房	0	0.41±0.49	0.50±0.50	0.57±0.49
	利用设施生活能力	8.88±2.41	7.93±3.10	7.89±3.00	7.91±3.21
子女特征	儿子数(个)	2.01±1.11	1.98±1.13	1.97±1.11	1.96±1.09
	女儿数(个)	1.79±1.23	1.79±1.23	1.79±1.20	1.77±1.20
	至少有 1 个儿子居住在本村	0.48±0.50	0.43±0.49	0.40±0.49	0.39±0.48
	至少有 1 个女儿居住在本村	0.27±0.44	0.25±0.43	0.23±0.42	0.18±0.39
	有儿子外出打工	0.66±0.47	0.67±0.47	0.70±0.45	0.71±0.45
	有女儿外出打工	0.48±0.50	0.50±0.50	0.54±0.49	0.58±0.49
	儿子外出打工返回	0	0.24±0.43	0.27±0.44	0.27±0.44
	女儿外出打工返回	0	0.21±0.41	0.22±0.41	0.21±0.41

(续表)

变量	2009年(n=1 174)	2012年(n=933)	2015年(n=730)	2018年(n=578)	合计(n=3 415)
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千元)	2.37±2.87	3.12±3.43	4.52±4.62	5.10±4.74	3.58±4.00
提供经济支持(千元)	0.40±1.34	0.38±1.43	0.31±2.54	0.58±3.31	0.41±2.15
获得日常家务照料	1.38±2.97	1.27±2.94	1.50±3.10	1.33±3.11	1.36±3.02
获得日常起居照料	0.93±2.50	1.09±2.82	1.08±2.73	0.98±2.87	1.02±2.72
提供日常家务照料	0.52±1.78	0.30±1.22	0.45±1.55	0.34±1.36	0.41±1.50
提供日常起居照料	0.16±1.05	0.19±0.95	0.09±0.61	0.17±0.93	0.16±0.91
情感支持	7.49±1.26	7.60±1.21	7.88±1.15	8.06±1.15	7.72±1.22
提供孙子女照料	0.82±0.37	0.32±0.46	0.27±0.44	0.17±0.38	0.43±0.49

数据来源：“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中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跟踪调查数据。

3.2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老年人特征方面,年龄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有显著影响,年龄增加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及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均降低。老年人性别对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存在显著影响,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会降低42%。相比家庭结构未变动组,老年人丧偶后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二代直系家庭及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增加。拥有自己的住房使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降低。利用设施生活能力越好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上升而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降低。

在子女特征方面,儿子数越多,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上升,而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下降;至少有1个儿子居住在本村使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降低,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降低。

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增加;有儿子外出打工使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二代直系和三代直系的可能性下降,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增加;有儿子外出务工返回使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提高,而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降低。

在代际支持方面,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增加使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老年人所获日常照料的增加使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降低,变动为二代直系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增加。老年人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增加使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变动为二代直系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老年人与子女的感情越好,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降低。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具体见表3。

表3 家庭结构变动的回归分析结果[ $\text{Exp}(\beta)$ ]

变量	模型1: 单人家庭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隔代直系
		夫妇核心	二代直系	三代直系	
老年人特征 年龄(岁)	1.02	0.92 <sup>①</sup>	1.01	0.99	0.94 <sup>①</sup>
性别:女(男)	1.34	0.58 <sup>①</sup>	1.33	1.11	0.72
婚姻:有配偶→无配偶(其他)	58.47 <sup>①</sup>	2.98E-6	8.48 <sup>①</sup>	1.71	8.92 <sup>①</sup>
教育程度:上过学(没上过学)	0.76	0.89	1.24	0.93	1.00
独立经济收入:有(无)	0.83	1.30	0.69	0.87	0.90
拥有住房:有→有(其他)	0.55 <sup>①</sup>	0.70 <sup>①</sup>	0.44 <sup>①</sup>	0.49 <sup>①</sup>	0.68
利用设施生活能力	1.08 <sup>①</sup>	1.02	0.92 <sup>①</sup>	0.96	0.92
子女特征 儿子数	1.27 <sup>①</sup>	1.13	0.95	0.78 <sup>②</sup>	0.88
女儿数	1.02	1.02	0.92	0.94	1.04
至少有1个儿子居住在本村(否)	0.54 <sup>①</sup>	0.82	1.54 <sup>②</sup>	2.00 <sup>①</sup>	0.52 <sup>①</sup>
至少有1个女儿居住在本村(否)	1.26	0.97	1.38	1.33	0.62
有儿子外出打工(否)	0.91	1.38	0.49 <sup>①</sup>	0.49 <sup>①</sup>	2.70 <sup>①</sup>
有女儿外出打工(否)	1.15	0.98	0.84	0.76	1.05
儿子外出打工返回(否)	0.78	0.86	1.65 <sup>②</sup>	2.67 <sup>①</sup>	0.43 <sup>②</sup>
女儿外出打工返回(否)	0.92	0.93	0.88	1.09	1.73

(续表)

变量		模型 1: 单人家庭	模型 2: 夫妇核心	模型 3: 二代直系	模型 4: 三代直系	模型 5: 隔代直系
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增加(否)	0.95	0.62 <sup>①</sup>	0.73	0.68 <sup>②</sup>	0.96
	提供经济支持增加(否)	1.07	0.93	0.54	0.99	0.97
	获得日常照料增加(否)	1.05	0.59 <sup>①</sup>	2.76 <sup>①</sup>	2.98 <sup>①</sup>	1.16
	提供日常照料增加(否)	0.77	0.13 <sup>①</sup>	2.72 <sup>①</sup>	2.86 <sup>①</sup>	0.59
	情感支持	0.86 <sup>①</sup>	1.00	1.10	1.07	0.95
	提供孙子女照料(否)	0.84	1.06	1.25	6.57 <sup>①</sup>	11.70 <sup>①</sup>
常数项		0.02 <sup>①</sup>	51.58 <sup>①</sup>	0.02 <sup>①</sup>	0.10	3.83
样本数		203	245	124	139	84
Pseudo R <sup>2</sup>				0.190 3		

<sup>①</sup> P<0.05; <sup>②</sup> P<0.1。

#### 4 讨论

在老年人个体特征方面,对于增龄显著降低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和隔代家庭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年龄增大伴随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导致其更加需要子女的照料,同时其照料孙子女能力下降,因而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及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均降低。对于性别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显著影响,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会降低 42%,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家务分工的不同决定着女性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能为子女提供更多家务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女性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更依赖于子女,女性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远高于男性老年人<sup>[21]</sup>。对于丧偶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二代直系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的显著影响,本研究认为与子女外出的“报喜不报忧”相似,老年人虽然希望处于“儿孙绕膝”的家庭模式,但也总是尽可能独立生活不给子女添麻烦,因而老年人丧偶后在自主权较大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独居。对于拥有自己的住房对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显著影响,本研究认为拥有独立住房能够减少老年人老对子女的依赖,同时老年人也更倾向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独立居住,也体现了农村老年人养老观念的改变。对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变动为单人家庭,本研究认为这同样体现着农村老年人的“利他主义”思想。

在子女特征方面,对于儿子数越多越增加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降低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儿子越多时互相推诿养老责任的可能性越大,反而增加老年人单独生活的可能性。对于至少有 1 个儿子居住在本村降低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增加其变动为二

代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在有儿子居住在本村的情况下,老年人更愿意与子孙共享天伦之乐,其家庭结构倾向于变动为与子女同住。对于有儿子外出打工降低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二代直系和三代直系的可能性,增加其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而在儿子外出务工返回后反向变动,本研究认为老年人家庭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由子女的需求所决定,老年人尽可能为子女提供各种支持,这体现了老年人对子女的“奉献”精神。女儿数、女儿居住状况及外出务工状况均未对老年人家庭结构的变动有显著的影响,但在有女儿居住在本村时老年人更倾向于变动为二代及三代直系家庭,这反映了农村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仍然存在显著的性别偏好,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仍然发挥显著的作用。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上的性别偏好意味着女儿不是老年父母养老选择的优先人选,但女儿的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随着时代改变逐渐变化。

在代际支持方面,对于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增加显著降低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或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所获日常照料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其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而增加了其变动为二代及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是由于成年子女之间出于养老分工的不同,与老年人同住的成年子女在付出更多的照料时会相应地减少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而不与老年人同住的成年子女则倾向于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而不是日常照料,以维持代际间的和谐。另外,对于老年人在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照料支持时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则显著增加,本研究认为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变动可能很大程度上由代际交换所决定,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也是

为彼此提供照料的保障。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情感支持水平越高,则其家庭结构变动为单人家庭的可能性越低,老年人家庭结构的变动除了实现与子女之间物质性的交换外,感情性的交换也是影响其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会积极为子女提供代际帮助是老年人的“利他主义”在发挥作用。

## 5 小结

本研究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2009年—2018年的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一,老年人个体特征方面,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住房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均为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增龄显著降低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和隔代家庭的可能性;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夫妇核心家庭的可能性较低;拥有自己住房的丧偶男性老年人更有可能独居;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倾向于变动为单人家庭。其二,子女特征方面,儿子越多的老年人反而更有可能独居;在有儿子居住在本村的情况下,老年人家庭结构倾向于变动为二代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儿子外出务工会导致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下降,反而增加变动为隔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但随着儿子外出务工返回,老年人家庭结构更可能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而不是隔代直系家庭。其三,在代际支持方面,老年人所获经济支持的增加会导致其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下降,而代际间日常照料的增加会提高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成年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支持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代际间情感越好老年人越不容易变动为单人家庭,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家庭结构变动为三代直系和隔代直系家庭的原因,家庭结构的变动是亲代与子代双向选择的结果。

第二,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之间无论是物质性支持还是精神性支持均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是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支持水平上升促使老年人与子女之间更多的物质性交换,这符合合作群体模式下代际交换的目的是增强回

报能力的原则。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比例仍然在上升,这可能使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养老风险和死亡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外出务工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外出务工上升幅度略大于男性。

总之,上述研究体现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变动是基于老年父母个体健康需求,传统的性别偏好在农村仍盛行;研究揭示了家庭结构变动中中国传统“孝文化”、家族传承以及家庭成员的传统角色依然在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6 本研究的局限性

①本研究根据家庭结构二级划分类型的变动视角分析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但受限于家庭结构划分类型的复杂性及数据限制,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做进一步尝试。②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仅来自安徽省巢湖市的农村地区,尽管该地区整体的文化背景、养老传统及婚姻形式与我国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绝大多数地区相似,对于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否会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得到同样的实证结果,还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完善。

## 参考文献:

- [1] 陈宏胜,王兴平.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家庭空间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J].城市规划,2020,44(5):19–28.  
CHEN H S, WANG X P.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wide large-scale sample survey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44(5):19–28.
- [2] 王跃生.城乡家户、家庭规模及其结构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20(6):11–24;241.  
WANG Y 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or family sizes and structures [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20(6):11–24;241.
- [3] 王萍,王静,连亚伟,等.几辈同堂更幸福?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动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8,42(4):51–65.  
WANG P, WANG J, LIAN Y W, et al. How many generations living together makes rural elderly happier?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change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8, 42 (4):51–65.
- [4] 王跃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9(4):95–104.  
WANG Y S. Analysis on changes of rural family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4): 95–104.
- [5] WANG Y S.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rural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2020(1):102–124.
- [6] 仇志娟,杜昊.性别视角下的老年人口家庭结构影响因素及养老分析[J].经济问题,2015(1):34–39.

- QIU Z J, DU H. Factors affect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pens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ith gender perspective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5(1):34-39.
- [7] 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29(3):145-166;244.
- HU Z, PENG X Z. Househol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census data[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3): 145-166;244.
- [8] 韦璞.老年人居住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贵阳市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9,15(1):103-107;65.
- WEI P. Analyze on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aged in Guiyang: Guiyang city as an exampl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15(1): 103-107;65.
- [9] 穆滢潭,原新.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J].南方人口,2016,31(1):71-80;25.
- MU Y T, YUAN X. The effect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elder's mental health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on effect of culture situation and age[J].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16, 31(1): 71-80;25.
- [10] TSUYA N O, MARTIN L G.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Japanese and attitudes toward inheritance[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92, 47(2):S45-S54.
- [11] 王萍,左冬梅.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22(6):28-38.
- WANG P, ZUO D M.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bor outflow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 22(6):28-38.
- [12] 段世江,李薇.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8(1):89-93.
- DUAN S J, LI W. Research on rural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 factors in China [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3, 38(1):89-93.
- [13] GOLDSTEIN M C, KU Y, IKELS C. Household composition of the elderly in two rural villa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0, 5(2):119-130.
- [14] JOTHIKARAN T A J, MEERSHOEK A, ASHOK L, et al. Older adult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living arrangements in Southern India: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ositiv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20, 54:100867.
- [15] 余央央,陈杰.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居住安排与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健康[J].财经研究,2020,46(8):49-63;155.
- YU Y Y, CHEN J. Is it better for children to live near than under the same roof? Living arrangement and cognitiv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0, 46 (8): 49-63;155.
- [16] 陈功.我国养老方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 CHEN G. *Research on China's pension method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1.
- [17] 宋璐,李树苗.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0,32(2):35-42.
- SONG L, LI S Z. The impact of care for grandchildren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J]. *Population Journal*, 2010, 32(2):35-42.
- [18] CONG Z, SILVERSTEIN M. Par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pport from sons and daughters in rur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 20(s1):s4-s17.
- [19] CHEN 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well-being in old age in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China[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UK, 2013.
- [20]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26(1):96-108;207.
- WANG Y S.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 26(1):96-108;207.
- [21] 张争艳,王化波.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6,38(1):88-94.
- ZHANG Z Y, WANG H B. Analysis of the desire on old-age support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 in Zhuhai city [J]. *Population Journal*, 2016, 38(1):88-94.

(收稿日期:2021-04-08;修回日期:2021-12-01)

(本文编辑 崔晓芳)